

《寒夜》研究资料选编
上册

周立民 李秀芳 朱银宇 编

《寒夜》研究资料选编

上册

周立民 李秀芳 朱银宇 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录

巴 金	谈《寒夜》	1
	《寒夜》后记	1
	谈《寒夜》	3
	关于《寒夜》	12
	知识分子	
	——随想录九〇	22
	与《寒夜》剧组主创人员的谈话	25
	《寒夜》杂谈	40
康永年	《寒夜》	48
[法]明兴礼	动摇的“家”：《寒夜》	54
[日]吉川幸次郎	吾之阅读再读之书	58
巴金作品《寒夜》合评		60
在战争下 [日]木岛廉之		60
树生 [日]穴山严子		63
寒夜——关于树生的生活方式 [日]外河与志子		66
巴金的悲剧 [日]前田苓子		67
杂谈 [日]松崎治之		70
文宣的生活方式 [日]小西升		72

[日]常石茂	关于巴金和《寒夜》	75
[日]立间祥介	《寒夜》日文译本解说:巴金	79
[日]冈崎俊夫	《寒夜》《第四病室》日文译本后记	87
[美]内森·K. 茅 刘村彦	巴金和他的《寒夜》	93
[法]艾坚尔伯	《寒夜》法译本序言	113
[德]沃尔弗冈·库宾	《寒夜》德文译本后记	117
[挪威]克里斯多夫·哈布斯麦尔	《寒夜》挪威文译本序	124
司马长风	巴金的“人间三部曲”	127
田一文	忆巴金写《寒夜》	131
长缨	谈巴金《寒夜》的法译本	136
司马长风	巴金《寒夜》显才华	140
[日]村冈圭子	《寒夜》解说	142
陈则光	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 ——读巴金的中篇小说《寒夜》	146
[日]岛田恭子	关于《寒夜》	159
周芳芸	论《寒夜》家庭悲剧的根源	165
王火	《寒夜》琐谈	174
曾冬水	一个性格充满着矛盾的人物 ——也论《寒夜》中的曾树生	178
钱虹 金辉	《寒夜》悲剧新探	183
张焱	《寒夜》中婉曲手法的运用	194
刘晓林	《寒夜》与《外套》心理刻画比较探索	204
薛伟	也谈《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 ——兼与陈则光、戴翊二先生商榷	214
[捷]高利克	巴金的《寒夜》:与左拉和王尔德的文学间关系	222
刘慧英	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 ——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	248

刘艳	情感争夺背后的乱伦禁忌 ——巴金《寒夜》新解	257
辜也平	传统叙事母题的现代语义 ——《寒夜》人物论	264
张伟忠	《寒夜》:复调的回响	273
张沂南	论女性的自我生命选择 ——也谈《寒夜》	280
蓝棣之	巴金:《寒夜》	291
方允瑜	契诃夫《苦恼》与巴金《寒夜》的比较	299
[日]川田进	《寒夜》的梦的解析 ——汪文宣的自我	306
[韩]朴兰英	巴金《寒夜》的现实主义研究	318
[韩]郑守国	巴金《寒夜》的空间意象分析 ——以作家对中国抗战时期社会的 现实意识为中心	334
陈少华	二项冲突中的毁灭 ——《寒夜》中汪文宣症状的解读	351
[日]河村昌子	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	363
曹艳红	人到中年 ——从《憩园》与《寒夜》看巴金 40 年代小说的特色	373
邵宁宁	抗战生活与知识分子精神气质 ——论《寒夜》并兼及《围城》	383
金宏宇 彭林祥	《寒夜》版本谱系考释	394
李雪华	不同性别视角下的婆媳关系 ——巴金《寒夜》、铁凝《玫瑰门》比较解读	405
王新玲	《寒夜》:性别期待的错位导致的悲剧	411

陈国恩	启蒙神话、命运悖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遭遇	
	——关于《伤逝》与《寒夜》的笔谈	416
	胡群慧:互文与知识分子两性关系逆转的文化进程	417
	张 贇:现实生活的情感投影	419
	杨永明:女性解放的社会怪圈	422
	俞春玲:理性追寻的错层与断裂	424
	徐 茜:相同的悲剧主题,不同的生命感受	427
	帅 彦:从《伤逝》到《寒夜》——启蒙神话的反思	429
	刘 慧:从身体的反抗到灵魂的反抗	431
	胡朝雯:妇女解放的出路何在	434
李雪荣	生亦何欢,死又何哀	
	——《寒夜》与《一地鸡毛》中男主人公之比较	437
徐礼佳 傅宗洪	从《寒夜》和《花凋》的比较谈当代情境下 对现代小说的接受	443
刘青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	
	——解读钱锺书《围城》与巴金《寒夜》	449
肖照东	守与放	
	——巴金《寒夜》叙事结构的分析	459
张继红 张学敏	从《家》到《寒夜》看巴金小说的文本裂痕 ——兼论其家族伦理演变与叙事逻辑的关系	465
[韩]朴宰范	巴金《寒夜》研究 ——以与早期作品《家》的对比为中心	474
[日]中村俊也	巴金的作品世界 ——关于《寒夜》	494
曹禧修	《寒夜》:消耗性结构的悲剧	522

[美]毕克伟	巴金的《寒夜》与抗战时期及战后的愤懑文化	535
周立民	《寒夜》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	545
[德]顾彬	谈《家》《憩园》《寒夜》	568
王立	《寒夜》中树生的离家出走 ——巴金笔下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破灭	579
陈思广	定位与拓进 ——1979—2009 年的《寒夜》接受研究	596
谢君兰	汪文宣的生活困境 ——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解读《寒夜》	610
黎保荣 梁德欣	光背后的阴影 ——《寒夜》和《金锁记》中的“光”意象比较	622
张义奇	大后方文学的双城记 ——《寒夜》与《天魔舞》异质同构的悲剧叙事	632
刘灵昕	《寒夜》篇名符号的修辞解读 ——从语篇命名到语篇修辞建构	639
李新宇	再论巴金长篇小说《寒夜》的艺术价值	652
赵静	另类的都市漫游 ——对《寒夜》的再次重读	659
廖海杰	“经济非正义”的有限批判与“救出我自己”的无根追求 ——理解巴金《寒夜》的一种思路	674
熊静文	“走”与“停”:论巴金小说中家庭观念的演变 ——以《家》《憩园》《寒夜》为例	685
徐钰豪	杜大心与汪文宣:巴金笔下的肺结核患者	705
编后记		722

谈《寒夜》

巴金

《寒夜》后记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

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社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据《巴金全集》第8卷收入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谈《寒夜》

我前不久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面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像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像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患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

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像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习的，咖啡店是我熟习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习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习。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像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像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

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感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的看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这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被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像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镂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

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像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像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

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香港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者。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像我的朋友彼得罗夫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像汪文宣和

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香港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像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整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合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钟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

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可能在陈

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像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热。儿子像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像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①。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

① 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